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剖析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幾個問題

doi:10.30390/ISC.198308_22(11).0003

問題與研究, 22(11), 1983

Wenti Yu Yanjiu, 22(11), 1983

作者/Author：王承宗

頁數/Page：32-4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8_22\(1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8_22(1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剖析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幾個問題

王承宗

壹、前言

去(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至廿一日，中共「副外長」錢其琛與蘇聯副外長伊利契夫(L. Il'ychev)在北平舉行第一回合磋商；今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雙方易地在莫斯科進行第二回合磋商，會後決定繼續擇期談判。北平與莫斯科對這二次的磋商均未透露詳細內容，但是據說雙方會談時氣氛甚為友好熱烈，儘管彼此並未作出相對讓步、取得重大突破。近年來，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已呈現霜消冰解的跡象，二者的實質接觸、交往亦漸趨密切頻繁；雙方關係的緩和改善必然對有關方面造成或大或小的影響。雖然「中」蘇和解尚在起步階段，吾人對其未來發展却不能不予以密切注意；而瞭解雙方近年來的接觸情形、舉行磋商的動機、以及相關問題的內涵，更有助於認識並判斷「中」蘇關係未來動向。

貳、關係正常化發展過程

自六〇年代「中」蘇雙方公開鬧翻之後，兩造關係即陷於相互敵對、詆譏、叫罵的最低潮，甚至演出邊界地區的武裝對抗。蘇聯在邊境增駐重兵以示威嚇，中共則叫囂蘇修、社帝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呼籲反霸、反帝鬪爭。但是雙方的外交關係始終未曾斷絕，「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仍然存在。七〇年代伊始，蘇聯再三提出修復關係的建議，惟中共動輒加以拒絕。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宣佈同盟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中共「外長」黃華於四月三日召見蘇聯大使謝爾巴科夫(I. S. Shcherbakov)當面說明此項決定，並且宣佈「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為此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建議，中蘇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

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①。由於同盟條約即將於八〇年四月十一日滿期，雙方仍有許多問題未決，中共建議舉行關係正常化談判自然為蘇聯所接受。七九年九月底，伊利契夫和中共「副外長」王幼平在莫斯科展開首次關係正常化談判，並且決定次年春在北平續行談判。七九年十二月下旬，蘇聯大舉侵略阿富汗，翌年元月，中共「外交部」聲明「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世界和平，也威脅著中國的安全，並為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製造了新的障礙。在當前情況下，進行中蘇談判顯然是不適宜的」^②。從而無限期延擱預定在北平舉行的第二回合正常化談判。

八〇年七月，當時的中共「副總理」李先念表示：「如果莫斯科不能做到下列幾點，中國是不會恢復談判的：——把在中國邊界的五十四個蘇聯師減至赫魯雪夫六〇年代當政時的十二個師。——從外蒙邊界撤走所有的軍隊。——停止支持越南駐軍柬埔寨。——從阿富汗撤出所有的蘇聯軍隊」^③。儘管中共強烈譴責蘇聯侵略阿富汗，杯葛八〇年莫斯科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設定重開正常化談判條件，但是在蘇聯主動外交攻勢下，中共的態度似乎慢慢轉變。

一九八一年二月蘇聯共黨廿六屆代表大會時，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總結報告中聲明：「蘇聯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尋求與中國對抗。我們遵循蘇共「廿四大」與「廿五大」所確定的方針，在善鄰的基礎上與它建立聯繫。旨在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建議仍然有效」^④。八一年三月七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向中共「外交部」送交一項建議，希望共同討論如何在遠東地區實行增進相互信任的措施，以便降低該地區緊張情勢及鞏固和平。中共並未正式答覆這項建議，但在報刊上說明，既有人造衛星的監視，這類措施沒有用處，而且蘇聯的建議「旨在反對美日軍事聯盟，以及反對美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戰略協調」^⑤。八一年九月廿五日，蘇聯外交部向中共駐莫斯科「大使館」致送照會，建議恢復七八年六月以後未再召開的邊界談判；十二月廿六日，中共答覆表示：此種談判確有恢復必要，但是雙方須預作基本準備，故建議無限期延緩。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蘇聯建議恢復雙方的科學技術合作，首先在對等的基礎上交換一至二個專家訪問團，例如生絲紡織、磁器、礦肥、化學農藥的生產技術專家的訪問。中共亦未直接答覆這項建議。不過在一九八一年間，有四個蘇聯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參加各種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有十七個中共學術團體到蘇聯參加科學會議。八一年十一月，中共體操隊到莫斯科參加第廿一屆世界錦標賽，並出席第五七屆國際體操聯盟大會^⑥。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元月廿一日。

註③ 香港 [文匯報]，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八日。

註④ Pravda, Feb. 24, 1981.

註⑤ Problems Dal'nevo Vostoka, 1982, N. 2, Pp. 22-23.

註⑥ 同註⑤

進入一九八二年，中共與蘇聯的接觸活動更加頻繁。元月蘇聯「蘇中友好協會」副主席（原任主席死亡）、蘇聯外交部直屬外交學院院長齊赫文斯基（S. Tikhvinsky）到北平訪問兩星期，會晤「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齊某原先在日本旅遊，突然提早結束行程匆忙返回莫斯科，而後再趕往北平。因此日本人士推測齊某的私訪北平與後來三月的塔什干宣言有密切關連^⑦。二月間，「中」蘇簽訂鐵路貨運協定，中共貨櫃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轉運至西歐和伊朗，中共「新華社」特意對此事加以報導。同月，蘇聯再致送新照會，要求恢復邊界談判，表示注意到中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的答覆，並且等待中共做好談判準備的通知。三月間，中共三名經濟學者訪問蘇聯，研究考察蘇聯的經濟計劃、管理制度及其他問題，並且拜會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巴楚林（A. Bachurin）。同月，中共體操隊赴蘇聯參加「莫斯科新聞杯」國際體操賽。四月，雙方在北平簽訂年度貿易協定，預定八二年雙邊貿易貿易額增加四五%。五月，蘇聯外交部遠東第一司司長卡庇查（M. Kapitsa）私訪北平，會晤中共「副外交部長」錢其琛和「蘇歐司司長」于洪亮。同月，中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代表團訪蘇，滯留二週，參觀莫斯科輕工業品展覽會。六月，蘇聯田徑選手參加北平國際田徑邀請賽，這是十六年來蘇方運動員首次在北平與賽。八月，中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于洪亮訪問蘇聯和波蘭，並於十九日禮貌性拜會蘇聯外交部。九月，中共與蘇聯簽訂「圖書出版品互相交換協定」；蘇聯「蘇中友好協會」在莫斯科為中共政權三十三週年舉行慶祝會。十月，蘇聯副外長伊利契夫率領代表團赴北平參加「中蘇副外長級磋商」，圖謀改善雙方關係。十一月布魯去世，中共「外長」黃華赴莫斯科弔喪，會見蘇共新任總書記安德洛波夫，並與蘇外長葛羅米柯會談。十二月，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兼工業食品局長率團訪問北平；莫斯科芭蕾舞團抵北平演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六十週年，中共「人代會常委會」與「國務院」去電祝賀，「國務委員」黃華（已卸「外長」職）和「人代會副委員長」烏蘭夫、中共軍「副總參謀長」徐信出席蘇聯駐北平大使館慶祝蘇聯成立六十週年的招待會。

到一九八三年，中共與蘇聯的接觸持續進展。二月間，蘇聯「消息報」政治評論員波文（A. Bavin）訪問北平。三月間，中共與蘇聯舉行第二回合磋商時，簽訂交換留學生協定；雙方簽署八三年度貿易協定，規定雙邊貿易額比八二年增一·七倍，約八億美元；雙方旅遊代表洽談籌備相互接待遊客問題，商定起草旅遊協定。四月間，「中」蘇雙方簽訂兩項發展邊境貿易協議，一是越過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易貨貿易，另一是蘇聯西伯利亞南部邊區與中共內蒙北部地區的貿易。邊界貿易停頓幾近二十年而後恢復，足見二者間關係確實有相當改善。

叁、尋求關係正常化的動機

註⑦ 菊地昌典：「絕望の選擇——中ソ和解」，頁廿三。

單憑蘇聯單方面主動示好，再三表露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意願，絕難促使對方接受。祇有雙方具共同意願時，才能推動正常化步調。而二者願意坐在談判席上磋商各項相關問題，其背後的動機甚為重要。

從蘇聯的立場而論：

(1) 阻止中共進一步傾向西方，如果北平與西方聯合建立反蘇陣線，對莫斯科顯係不利。中共自五〇年代的反美親蘇，演變為六〇年代的反美反蘇和七〇年代的反蘇親美，而且北平領導階層在近十年的言論行徑確使蘇聯難以放心。蘇共「真理報」近幾年一直刊載批評中共對外政策的論文，其中以亞歷山德羅夫 (I. Aleksandrov) 最具權威，據悉此係蘇共領導階層的化名。亞某撰文批評「在毛的時候，北平對外政策路線的特點是極端的反蘇維埃主義，敵視蘇聯的朋友。當時北平領導運用最大的努力爲了要組織某種『最廣泛的國際統一陣線』，簡言之，就是聯合敵視蘇聯、社會主義的任何勢力之聯盟」^⑧。亞某更進而明言「華盛頓與北平在秘密協定基礎上，在中國西北建設兩座裝置美國設備的監聽站，中共人員在中央情報局指導員領導下爲之服務。如果華盛頓打算利用中共領導無耻的反蘇主義使美國的全球反蘇戰略獲利的話，那麼北平自己的私慾則是：爲了在核子衝突之後宰割世界，而將美國與蘇聯推進核子衝突裏。總之，中共扮演著美帝國主義年幼的夥伴與幫凶這一無耻的角色」^⑨。莫斯科攻訐中共與西方親近，甚至直指中共是北約第十六個準會員國。美國、日本與中共若果在亞洲結成反蘇聯盟，勢將造成莫斯科最大的隱患。蘇聯爲了阻止中共與西方的進一步接近，勢必主動尋求與中共和解。

(2) 解決社會主義危機問題需要中共的和諧合作。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面臨內外交困之際，蘇聯亟待解決本國經濟成長遲滯、軍費過度負荷、社會秩序日趨混亂等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普遍出現經濟困難及對共產理論信念的動搖傾向。波蘭工潮帶給蘇共集團莫大威脅，自詡爲勞工階級代言人的共產黨（勞工黨）竟然遭到工人的反對唾棄。自由工會運動的蔓延在東歐形同毒草，因此儘管西方同聲支持波蘭團結工會，譴責波共鎮壓，中共却不敢與西方同調，僅能表示波蘭事務應由波蘭人自行解決。阿富汗問題的解決亦須取得中共的支持，否則蘇聯將愈陷愈深，無法自拔。至於高棉問題，中共支持原波布政權及目前的反越三邊聯盟，使越南陷入泥淖，也間接加重了莫斯科對河內的軍經援助負擔。如何取得中共諒解，合理解決中南半島僵局，自亦在蘇聯考慮之內。

(3) 爭取中共回歸共產陣營、增加蘇聯在中共內部的影響力。雖然蘇聯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僅處於起步階段，但就遠程觀點而言，雙方「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臻於改善後，黨與黨的關係也未必不能恢復正常，中共回歸共產集團的可能性不應予以排除。再就目前而言，在蘇聯與中共正常化發展的過程中，蘇聯仍可藉著雙方交流增進其在中共內部的影響力。去年十二月莫斯科芭蕾舞

註⑧ Pravda, May 26, 1980; I. Aleksandrov, Peking: Kursom Nagnetanija Napryazhennosti.

註⑨ Pravda, June 27, 1981; I. Aleksandrov, Eskalatsiya Bezrassudstva.

舞團在北平演出獲得觀眾的激賞，有些觀眾甚至以俄語和演員交談^⑩。今年二月「新華社」報導，為紀念蘇聯建軍六十五週年，中共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領導人和「中蘇友協」分會領導人都向蘇軍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⑪。而中共內部對蘇聯懷有好感的人士不在少數，這些與蘇聯有過接觸或留學蘇聯的人士在「文革」時期慘遭清算，現在都已平反；而且他們目前多是中共經建的中堅力量^⑫。莫斯科若能籠絡這些人員，不僅可以增強自己的影響力，甚且可能製造中共內部的分歧。此外，中共軍中同樣有不少親蘇份子，蘇聯與他們建立接觸與聯繫，至少足以減低中共與西方國家軍事交流所產生的副作用。就中共的立場而論：

(1) 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需要有一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與蘇聯的緊張對峙並不符合北平的利益；同時過度龐大的軍事支出不免相應減少國民經濟建設投資資金。七〇年代中共用於核子與傳統武裝計劃的經費大約佔了「國家預算」的四〇%^⑬。因此減少軍事支出之前提似乎是必須尋求與蘇聯的緩和，從而全力進行國內經濟建設。

(2) 推行獨立外交。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報告中表明「我們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在獨立對外政策下，中共自詡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鬪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⑭。中共恢復反對美國與蘇聯兩個霸權主義，不再特定反對蘇聯，同時亟欲拉攏第三世界國家，企圖以第三世界發言人自居。如果中共與華盛頓走得過近，必會招致不結盟運動、主張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的落後國家的不滿，尤其是激烈反西方的少數國家。但中共又不能與美國距離過遠，否則可能增加西方對中共的疑忌，而使中共喪失爭取科技、資金的机会。中共執行獨立外交，雖然說不打「蘇聯牌」，也不容許美國打「中共牌」，但實際上三方面都在打牌，為各自爭取最大利益。

(3) 擴大吸收外國經濟、科技合作機會。北平打出「蘇聯牌」，與莫斯科進行關係正常化，不僅可逐漸恢復雙方的經濟交流；而且可以藉機訛詐西方，冀圖取得西方高級科技和低利率資金。西方為恐中共再度倒向或過度傾向莫斯科，並且希望利用經濟、科技合作與援助從中獲利，及使中共「資本主義化」，也可能誤中北平的圈套。

(4) 離間蘇聯與越南及偽蒙之間關係。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教訓越南，並未得到預期效果，反而損兵折將。蘇聯圖謀利用越南

註⑩ 〔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⑪ 八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V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五日播。

註⑫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蘇聯短期、長期訓練中共技術人員、勞動者約一萬名，科學家一千名、留學生一萬一千名，這些人員今日多為中上級幹部。

註⑬ *Far Eastern Problems*, 1982, N. 3, P. 92.

註⑭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高棉境內的軍事基地擴大其在亞洲區域的軍事影響力；而越南本身迫切需要莫斯科的軍經援助，以遂其建立「印支聯邦」的野心。在此情形下，「中」蘇和解可能會使印支半島的局勢發生重大的變化。其次，中共要求蘇聯自偽蒙撤軍，儘管克里姆林宮拒絕涉及第三國的問題，惟雙方友好磋商，不免令烏蘭巴托有所疑慮。

肆、正常化的障礙

儘管北平與莫斯科已逐步走上了關係正常化途徑，但是，在此一途徑上仍存在著許多障礙，其中有些是中共自行提出設定的，能否消除固然須視北平與莫斯科的共同努力而定，也有賴於客觀環境的實質變化；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共本身對障礙的見解與決心有否更易。所謂阻擾雙方正常化的主要障礙大致有下列數項：

(1) 民族情感與猜忌心——俄羅斯自清朝以來數百年素為中國大患，雖然俄共革命成功後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簽署加拉罕 (J. Karakhan) 宣言，一九二三年元月發表 國父孫中山與越飛 (A. Joffe) 共同宣言，對中國與中國國民黨示意友好，但俄共始終未以實際行動表示誠意，反而圖謀分裂、赤化中國。中共竊據大陸後，毛澤東雖然宣佈向蘇聯一面倒政策，中共與蘇聯雖然同屬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但蘇聯並未放棄控制中共的野心。蘇聯對中共實施不平等的貿易、差別援助，強迫中共負擔韓戰軍事重荷，要求管理中共核武器等，使北平對莫斯科有所疑忌^⑮。中國民族對俄國的惡感再加上早期中共政權和其莫斯科主子交往的經驗。不免影響雙方關係未來的發展。再者，六〇年代雙方交惡後，中共極力醜化蘇聯的宣傳及鼓動反蘇情緒，使六〇、七〇年代成長的中國大陸青年飽受反蘇思想的「污染」。因此，一旦北平與莫斯科關係急劇友好，可能使這些青年難以適應，甚至對中共宣傳教條發生不信任感。

(2) 蘇聯軍事威脅——中共聲言蘇聯在邊界陳兵百萬，對之造成莫大威脅，所以要求莫斯科裁減邊界武力。惟事實上蘇聯遠東、外貝加爾、西伯利亞、中亞四個軍區共有六個裝甲師、四十一個摩托化步兵師、三個炮兵師，總兵力約四十六萬^⑯，如果加上邊界警衛部隊與太平洋艦隊、戰術空軍，總兵力尚不足百萬。而中共的瀋陽、北京、蘭州、新疆各軍區共六十六師，一百五十萬名部隊。雖然中共的火力、機動力遠遜蘇聯，但是蘇聯在中蘇邊界的部署原則，係以防禦為主體^⑰。莫斯科將四分之三的武力部

註⑮ 請參閱《問題與研究》(日文版)一九八三年三月號，頁五五—五七。

註⑯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2-1983, P. 15. (這些師包括蘇聯駐偽蒙部隊在內)；在日本防衛廳一九八二年版《防衛白書》，頁三七，則說明蘇聯有五師在邊區，其中包括駐偽蒙五個師。

註⑰ Allen S. Whiting, *Siberian Development and East Asia: Threat or Promise*, P. 163.

署在西線，用以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部隊相對峙，祇有四分之一部隊放在東線，從俄屬中亞延伸至西伯利亞及俄屬遠東區。儘管蘇聯具有兩翼作戰能力，但東線仍是較為脆弱的。因此中共「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現任「委員長」）曾表示「蘇聯可以隨時揮軍入侵，但中國並不怕，因為蘇聯部署在邊境的百萬大軍並不足以戰勝中國」^⑮。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歐尼爾（Robert O'Neal）亦表示「北平認為蘇聯對中共不再有直接的威脅，這種想法愈來愈強烈」、「七八年以來，中共方面所提與蘇聯戰爭不可避免的警告已實質消失。中共考慮到蘇聯沒有直接的威脅，其結果促使中蘇交涉重新開始」^⑯。

既然中共對蘇聯軍事威脅有新的認定與自信，就不需要強調與美、日的戰略平行利益，也不必與蘇聯發生直接衝突；何況與美、日的戰略結合可能使中共陷入陣前卒的悲劇。北平與莫斯科關係和解，或許能促使蘇聯自動減少部署在邊境的武力，緩和中共自謂的壓力。蘇共「真理報」總編輯阿法那謝夫（V. Afanasyev）對此問題表示「雙方應允相互減少在邊境的武力是可能的」^⑰。不過相互裁減仍然使中共的邊區武力屈居下風。蘇聯若果作象徵性裁撤，而且在北平能夠接納的範圍內，雙方的關係自然可順利進展。客觀而論，莫斯科可能會將部份武力自大西伯利亞鐵路沿線轉撤到新建的貝阿鐵路（BAM）沿線區，減緩對中共的壓力，並以此行動證明其尋求關係正常化的誠意，同時亦不致於過度減少蘇軍的機動能力。

此外，真正部署在邊界線的蘇軍祇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邊防部隊，職司警戒安全與緝查，這支部隊並非正規作戰軍。近年來雙方的邊界緊張氣氛已大為緩和，而中共與蘇聯已同意開放邊界貿易，足證邊界情勢已隨著雙方有意和解而好轉。

③外蒙駐軍問題——中共要求蘇聯撤走駐在外蒙的部隊，這與布里茲涅夫所提「中」蘇正常化談判不應涉及第三者的原則不相符；而且蘇聯蓄意維護外蒙傀儡政權亦不容中共橫加干涉。蘇聯駐軍外蒙為時甚久，一九四六年即簽訂「蘇蒙聯防條約」，期限廿年；一九五六年蘇聯自外蒙撤軍；中共與蘇聯齟齬之後，莫斯科於六一年再度在外蒙駐軍。一九六六年元月訂立「蒙蘇友好互助條約」，目的在防範中共侵蒙意圖。六七年蘇聯大量駐軍外蒙而維持迄今。顯然，蘇聯駐軍外蒙與中共、蘇聯關係惡化有關。

今年五月間，外蒙大舉驅逐當地華人，據悉約有萬名華人可能被迫放逐邊遠地區的農場或逐回中國內地^⑱。而中共的反應相當軟弱，在抗議照會中祇是說明「爲了保護華僑正當權益，爲了中蒙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兩國關係的改善，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曾向蒙方進行了十四次交涉，再三表示希望蒙方不要擴大事態，建議通過協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中方的態度是克

註⑮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

註⑯ 〔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

註⑰ The Japan Times, Nov. 17, 1982.

註⑱ The Japan Times, May 28, 1983.

制的，提出的建議是積極的、真誠的和合理的……」²⁰。這種克制的態度顯然是不希望爲了外蒙自三月間開始的排華舉動而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中共爲了保護「華僑」所能表現的亦祇是向外蒙提出多次的交涉而已。北平既然事實承認外蒙爲獨立「國家」、外蒙的華人爲「華僑」，則蒙古根據「蒙蘇友好互助條約」而「請求」莫斯科派軍駐在蒙境，中共自無干預的理由。蘇軍之撤與不撤，端賴蘇蒙之間的協議。縱使蘇軍撤出蒙境，部署在貝加爾湖東岸山區的蘇聯飛彈仍然可以直接威脅中共。因此，北平要求蘇聯撤軍的真正目的可能只是爲了在談判席上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已！

(4) 阿富汗問題——中共認爲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著中國的安全，並爲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製造新的障礙」。因此，要求蘇聯大軍撤出阿富汗成爲中共開出的正常化談判條件之一；但是阿富汗問題是否構成雙方關係間的重大障礙，委實值得斟酌。蘇聯進侵阿國且在當地駐紮大軍、興建軍事設施，三年多來遭到阿富汗游擊隊不斷的騷擾攻擊，而莫斯科一手扶植的卡邁爾政權疲弱不振、失却民心。美國、中共與巴基斯坦及其他回教國家經常支援阿富汗反蘇游擊隊，使蘇聯不僅無法有效控制阿國，反而陷身泥淖難以自拔。蘇聯佔領阿富汗之目的在於阻止其傾向西方，並進而由此南下，染指波斯灣。按理，直接感受威脅的應當是巴基斯坦與伊朗。不過伊朗與伊拉克鏖戰將近三年，無暇顧及北方阿富汗的變局。巴基斯坦的齊亞政府則藉此變局不但使美國恢復七九年四月中斷的援助，而且促使雷根政府劇增軍、經援助，同意給予十六億美元武器，包括四十架F-16戰鬪機²¹。這種戰鬪機性能和印度採購的法國幻影二〇〇〇型飛機相似。齊亞總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區部署兩師部隊，但在印度、巴基斯坦邊區却有十七師部隊²²，顯見巴基斯坦主要防範對象是印度，而非駐在阿富汗的蘇軍。阿富汗總人口約一千五百多萬，可是巴基斯坦聲言在巴國境內的阿富汗難民約二百七十萬，在伊朗境內約一百萬；喀布爾政權則聲稱真正難民祇有六十萬名，其他兩百萬名係游牧百姓，經常往來阿、巴邊區；巴基斯坦誇大難民數字係爲了獲得西方、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國家的軍經援助²³。不過難民問題確是巴國亟欲處理的難題；因此在聯合國主持下巴國與阿富汗舉行間接談判，巴國堅持四個條件（蘇軍撤退、遣返難民、阿富汗保持不結盟國地位、阿富汗人民自決選擇所要的政府）²⁴。蘇聯雖然同意撤軍，但其先決條件是訂立國際協定保證不干涉阿富汗內政、阿富汗嚴守中立、阿富汗人民自決及民族主義、溫和的政權不能對蘇聯、巴基斯坦或中共有敵意²⁵。以政治談判解決問題

註²⁰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

註²¹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13, 1982, P. 39.

註²²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4, 1982.

註²³ The Japan Times, Aug. 30, 1982.

註²⁴ 同註²³，P. 41.

註²⁵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8, 1982.

雖是有關方面所認同的，惟彼此間開列條件相異，在未能取得國際保證時，蘇聯是不會撤軍的，而且問題亦無法迅速解決，莫斯科更希望繼續維護卡邁爾政權的存在。

從中共立場而言，如果能使蘇聯在阿富汗陷於泥淖、繼續消耗國力，是為上策。克里姆林宮若無法平服阿富汗游擊隊的破壞行動，則阿富汗的高原峻嶺勢將變成當年美軍在越南所面對的叢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共曾與阿富汗訂立邊界協定，放棄瓦漢(Wakhan)走廊的領土要求，因此對於蘇軍在中阿邊界阿富汗區域部署武力自然感受威脅，最重要的是斷絕中共給與阿富汗游擊隊的直接援助，而必需假道巴基斯坦。不過比較起來，對中共較具威脅性的仍是蘇聯中亞軍區的武力，因其與中共新疆軍區相對峙。假定蘇聯有意以阿富汗為跳板，南侵波斯灣，受害最大的當是伊朗與巴基斯坦兩國，而且也將損及美國在波斯灣、中東地區的「國家利益」。

(5)高棉問題——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舉進侵高棉，推翻中共支持的赤柬波布(Pol Pot)政權，扶植橫山林政府上臺，引發數年來的高棉內戰。爲了對抗駐在棉境的二十萬越軍與金邊政權，高棉反越勢力終於八二年七月組成三邊聯合政府，以施亞努爲首領。此一民主高棉聯合政府仍在聯合國保有席位。由於中共的背後支援與東協國家的聲援，反越勢力始得繼續和越軍對抗；而越南在蘇聯大力援助下也才能維持侵棉戰事之進行。據西方估計，在七九年莫斯科給與河內的軍、經援助每日約三百萬美元；八一年二月泰國軍方估計八〇年蘇聯的援助已增至每日六百萬美元^②。因此中共要求蘇聯停止支持越南駐軍高棉，促使河內撤退侵略軍。

北平指責河內是小霸，企圖將高棉、寮國加以控制，建立印支聯邦。越南一旦實現此一野心，對非共的東協國家將形成威脅，更重要的是造成中共與越南之間爭奪東南亞勢力範圍的衝突。各自獨立的越、高、寮，才是中共利益所在，北平方可滲透寮、棉，赤化東南亞。對莫斯科而言，印支聯邦也不一定全然合乎自己的利益，河內經常強調印支三國特殊關係、區域聯盟，以棉、寮代言人自居，不希望他國直接干預棉、寮事務。可是蘇聯却直接與金邊、永珍接觸，七九至八二年之間莫斯科給與橫山林政權三億二千九百萬美元援助^③，同時派遣顧問駐在棉、寮，協助其經濟建設與軍事指導^④。去年三月中共「國際問題研究」月刊特約評論員在「柬埔寨問題必須正確解決」一文裏認爲「越南與蘇聯之間確有矛盾，而且在發展。這主要是由於越南陷在柬埔寨戰場上，對蘇聯的要求越來越多，而蘇聯這些年來到處伸手，到處給自己背了包袱，也越來越難以滿足越南的要求，反過來責怪越南無能。……此外，越南要把老撾和柬埔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蘇聯却想直接插手這兩個國家，對越南過份強調越、老、柬

註^②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82 Yearbook, P. 27.*

註^③ [讀實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註^④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新華社記者李永明：「越加強軍事控制維持霸主地位」。

『特殊關係』並不滿意。」越南需要蘇聯的援助，蘇聯需要越南的軍事基地以擴展勢力。目前在金蘭灣、大叻（Danang）、邊和（Bien Hoa）和塔梭努（Tanh Son Nhut）四個海、空軍基地都駐有蘇聯顧問和軍事裝備，蘇聯艦艇與軍機經常在此區活動^②，不過莫斯科是否能夠全權控制這些基地仍然是個疑問。去年十月，中共與蘇聯在北平「磋商」之際，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趕往莫斯科和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晤，目的在瞭解內情。布魯在歡迎酒會中致詞暗示越南未能合理運用蘇聯援助，克里姆林宮已有不滿。去年十一月，長征親自參加布魯的喪禮，新任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並未接見長征，反而熱烈歡迎中共「外長」黃華。今年四月中旬，中越共發生邊界砲擊事件時，莫斯科居然以中立姿態報導二者間的激戰，兩不偏袒，對河內無疑又是一記悶棍。鑒於蘇越之間的齟齬逐漸滋生，河內愈來愈擔心蘇聯爲了爭取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可能降低對越南的支持。中越共之間、蘇越之間均有利益衝突。北平所提要求蘇聯停止援越不過是壓迫蘇聯解決三角矛盾、離間蘇越同盟的宣傳伎倆；如果越南撤出高棉，可能形成中共與蘇聯爭奪對高棉影響力的衝突，仍然會使東南亞局勢持續不安。

(6) 對外政策歧異——中共指責蘇聯對外實施霸權主義政策，趙紫陽表示：「中共對外政策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反對霸權主義，二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這兩條原則同樣適用於中國同蘇聯的關係」^③。因此中共不僅反對美霸，亦反對蘇霸，認定蘇聯霸權主義在全球擴張，四處樹敵。就莫斯科而言，中共對外政策偏離了馬列主義原則，分裂國際共產運動，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實力。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將蘇聯與美國並列爲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否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質，否定蘇聯是「愛好和平、爭取緩和、支持解放運動」的國家。中共企圖以第三世界盟友自居，領導第三世界與美、蘇抗頡，使自身由區域性大國躍進爲世界性大國；中共在對外關係發展過程中，極力爭取與國，打擊美蘇兩霸的聲譽。在不違反本身利益的原則下，中共可與美國或蘇聯採行相同的步調、策略與意見，以對抗另一霸。總之，中共在國際事務方面，處理本身與美、蘇之間的問題時，係使用「又聯合、又鬭爭」的策略，並非只站在與莫斯科一邊。這亦是蘇聯深感苦惱之處。

(7) 邊界問題——舊俄沙皇在十八、十九世紀掠奪中國近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不平等條約簽訂後俄國又零星侵奪邊界，擅移界卡，成爲中國與俄國歷史死結和邊界糾紛所在。中共與蘇聯蜜月時期從未提出邊界問題，雙方鬧翻後才要求舉行邊界談判，基本癥結在於蘇聯不承認滿清與沙俄簽訂的有關邊界條約、協定等是不平等條約，而中共堅持在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進行邊界重勘談判，表明不要求蘇聯歸還昔日沙俄佔領的土地；惟蘇聯堅決否認俄國曾經佔中國領土。邊界問題這種歷史死結非短時間所可解決。

註① 同註②。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

伍、美、日對「中」蘇正常化的反應

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正常化磋商，對相關國家帶來了不小的困惑與疑懼，各方面的反應態度與意見莫衷一是。

以美國方面而言，美國政府基本上持著審慎觀望的態度，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 (William Clark) 表示「我們密切觀察中 (共) 蘇關係。去年這兩個國家之間在溝通方面有了增加，但是肯定地我們判定雙方之間的關係對戰略均勢的影響並無變化。約百分之二〇至二五的蘇聯軍事力量仍駐留遠東」^⑤。去 (八二) 年十二月，當時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德里奇 (John H. Holdrige) 在評價美國與中共關係時，表示贊成中共要求蘇聯以行動、而非以言詞來證明解決問題的看法。對於中 (共) 蘇未來發展，霍某認為現在推測尚屬言之過早，惟「一般而言，我們歡迎減少地區與全球性緊張的發展。我們也歡迎真正的——而非單純表面的——蘇聯武力的裁減。無論如何，當他們進行這些談判時，中共應當不存幻想；而且他們必須好好警覺到蘇聯在烏拉爾山以東繼續部署先進武器，包括 S S—二〇飛彈與逆火式轟炸機」^⑥。儘管美國認為中共提出的正常化三條件 (自邊界與偽蒙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侵棉、自阿富汗撤軍) 若能實現，有助於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相符合；不過由於中共與蘇聯磋商時似乎未將蘇聯部署在遠東的戰略武器列入要求條件，如果雙方關係和緩，莫斯科即可能將其戰略武器的目標全部對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武裝設施，那麼華盛頓謀求的與中共戰略合作或平行利益均將落空。美國學者、政界人士對北平與莫斯科關係改善的看法甚不一致，有些是樂觀者，有些是悲觀者。拉薩特 (Martin L. Lasater) 在去年六月認為「儘管華盛頓集中努力要將北平拉進中 (共) 美戰略聯盟，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中共已下定結論，參加美國與北約、日本的反蘇陣營可能不是中共的最佳利益所在。……中共像其他國家一樣，追求其自己的利益。正如我們見過的，這些利益可能要依賴一項謹慎均衡於超級大國之間的對外政策。對美國而言，承認這項事實及相應調整其對中共政策，現在正是時候」^⑦。既然中共堅持獨立外交路線與認同第三世界，其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態度，自然會有變化。更重要的是，美國一向強調戰略合作，但中共始終未宣布這項合作的存在與意願，北平以往祇強調蘇聯的威脅，號召美、日、西歐與其他國家共同抗蘇。對中共而言，這是統一戰線的運用，而非合作、聯盟。

去年十、十一月間中共與蘇聯關係進展速度之快超過美國專家的預測，也使他們不再爭論這兩個共黨大國之間的關係無發生

註⑤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9, 1983, P. 39.

註⑥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1983, P. 8.

註⑦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8, 1982; Martin L. Lasater, Peking: no alliance against Moscow, thank you.

重大變化的可能性³⁸。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是一位波蘭移民，也是堅決反蘇的專家。他認為蘇聯的目的在「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藉以減低南部邊界緊張情勢，並繼續向西歐示好，藉以孤立美國。」在他看來，中共「準備多少修正與蘇聯的國家對國家的關係。」而且如果中共也「在黨對黨的關係上與蘇聯和解，並且達到某些意識型態的調解，那將是一件嚴重的事。那就意味著對蘇中（共）發展，我們不能做一個被動的旁觀者。我們必須重估美中（共）聯繫的情況」³⁹。布里辛斯基顯然耽心雙方和解會破壞美國辛苦建立的與中共的戰略合作，耽心「廣泛的戰略架構無法維持」。事實上他忽略了中共尋求自身的利益，並不一定會和美國的全球利益相吻合。美國的主動與中共發展合作或遷就北平的苛刻要求，是難以改變中共的意圖的。

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教授杜南 (Robert L. Downen) 對於中（共）蘇和解的看法似乎比較客觀。他表示中共如同任何主權國家將追求它感覺合乎其最佳利益的戰略政策路線，北平和美國從未成為盟國，所有的僅是有限的共同利益。杜南認為：(1) 今日北平提高其與蘇聯的接觸並非爲了對付有關臺灣主權的挑戰，而是爲了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持守戰略中立的當前利益。(2) 中共爲培養在第三世界的領導地位，需要在美蘇之間保持等距離地位，因此必須冷卻早期與美國過熱的商業與戰略合作，以及緩和與蘇聯凍結的關係。(3) 北平有意玩弄美蘇，使之互相對抗，希望藉此從美蘇那裏獲得重要政策讓步。(4) 美國在對臺軍售方面更多的讓步不會改變或阻止中共有害於西方利益的政策動向⁴⁰。

前美國總統福特和前國務卿季辛吉去年十月初認爲儘管中共與蘇聯增加接觸，但雙方不會立即和解，這是由於二者間的持續歧見。福、季二人強調美國應進一步努力以保持中共對西方陣營的向心力，美國不能讓中共偏向蘇聯，因爲中共具有戰略重要性⁴¹。美國若干學者或政界人士祇基於中共的戰略地緣位置，認定美國可利用中共抵制蘇聯在遠東的擴張，甚至使日本、中共與美國結成戰略聯盟，以與北約合作，共同對付蘇聯。但是他們都忽略了中共的意願與能力，而誤信了北平的反蘇宣傳。美國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的研究報告即指出：(1) 過去十年，美國對中共的外交與軍事政策在某些方面證明是不正確的。北平與華盛頓的和解證實並未改善美國對蘇聯的戰略均衡。事實上，美國過去十年來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戰略力量顯著下降。(2) 認爲中共軍隊在目前或不久的將來能有效對抗蘇軍，不僅是完全低估蘇軍能力，而且是過份高估中共軍力。(3) 主張中共是美國的忠實友人、實質的盟友，是錯誤的看法。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中共在基本上、思想上係反對美國的根本原

註³⁸ *The Japan Times*, Nov. 22, 1982.

註³⁹ *The Japan Times*, Dec. 6, 1982; Zbigniew Brzezinski, *Soviets Probe While U.S. Hesitates in China Ties*.

註⁴⁰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6, 1982, Robert L. Downen, *Sino-Soviet thaw: don't blame it on Taiwan*.

註⁴¹ *The Japan Times*, Oct. 14, 1982.

則與價值觀。雖然中共偶而會選擇與美國合作行動，但是它從未聲言與美國有共同利益。它僅聲言與美國有平行行動路線的可能。(4)多少誤以為中共政權穩定，並錯誤鄧小平有效地控制內政與軍事。(5)當美國一意專注於蘇聯威脅而視中共為亞太地區穩定的力量時，此一區域內的多數國家却認為北平的動機與行為值得疑慮^④。

而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顯示^⑤，持樂觀論的美國人士之中大半是以「中蘇即使關係改善，也不可能聯手對抗美國」為前提而對未來發展作預測。這些人士認為：(1)過去美國雖然從中(共)蘇對立得到利益。但今後沒有必要依賴中(共)蘇之間的敵對關係；(2)中(共)蘇即使關係緩和、美國也不致沒有利益。樂觀論人士亦認為，即使蘇聯接受中共改善關係所提要求條件，例如蘇聯減低對越南的援助，當可減弱越南企圖支配中南半島的野心。另外，若干人士認為北平與莫斯科若能緩和緊張，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當可從過去的反蘇戰略協調轉變為以能源開發等為合作中心，使雙方關係更趨密切。持悲觀論的人士卻耽心中蘇關係改善，對美國而言，是個重要問題。如果發展到技術上的合作，對美國會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軍方有關人士認為「中」蘇緩和的結果，使蘇聯得以加強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壓力，或者讓蘇聯獲得建設經濟的餘力，而導致將來的軍事擴張。有的認為中共同蘇聯的和解，將使美國與北平的軍事合作日漸困難，也會逐漸削弱中共對抗蘇聯的地位。但是，不論是樂觀論或悲觀論者，大多認為「中蘇間的動向不是美國所能控制的範圍」，亦即美國縱使希望改變「中」蘇關係的動向，其效果也是有限的。從這個觀點所得到的一般共同看法是：「美國此時改變政策為時尚早」。

但是，由於對「中」蘇關係的見解不同，美國方面對於今後政策選擇亦有不同的建議：(1)繼續努力改善對中共的關係，顯示美軍在亞洲的強大軍力，表明美國為美中(共)利益維持此一區域軍力均衡的決心。(2)經由減少對臺灣的武器銷售以及放寬對中共供應高級科技的限制，緩和中共的不滿。(3)為了彌補因「中」蘇關係改善所造成的損失，應加強在亞洲的美軍力量，並強化與非國家家的合作。(4)一方面維持與中共的建設性關係，另一方面改變對蘇聯的強硬路線，擴大相互緩和的範圍。

日本方面對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疑忌關切程度，不下於美國。祇是日本政府的態度比較保守，外務省認為中共同意與蘇聯會談的理由係中共擬將過度傾向西方的外交路線回轉至原先的方向；而且認為「中」蘇和解上有關意識型態的障礙已被除去。不過外務省並不認為「中」蘇關係會有急速進展，預料今後雙方會擴大貿易、經濟與文化交流等實質關係，至於政治關係即使有所進展也要相當的時日，在最近的將來其實質結構不會有何變化^⑥。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在今年元月初訪問倫敦，會見英國外相皮姆時指出：「中」蘇關係的改善在目前並無進展；而皮姆却認為「中」共並不以為三條件都要達到，才會改善雙方關係。這其中

註⑤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 The "China Card" Ace or Deuce?* (Jan. 25, 1983), p. 13.

註⑥ [產經新聞]，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

註⑦ [每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仍有迴旋的餘地。」不過安倍說明「如何把中共拉到西方是很重要的事」，皮姆強調「不論中共內部如何，使中共面向西方是重要的」。安倍也說明了中共與日本之間沒有進行任何的軍事合作，而且日本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件事，因為這在日本國策上是不可能的^⑬。總之，對日本而言，設法挽回中共，使其親向西方是件要事，至於事實如何，似乎並未作深入的探討與了解。

日本民間表現的態度顯然與政府不同，「讀賣新聞」在去年十月的評論裏雖然表示「爲了國際和平與安定之故，我們基本上歡迎中蘇關係的改善，……我們應當密切注意未來中蘇談判的發展，承認這是一個大的衝擊」^⑭。但是「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的評論員小川勝(Masaru Igawa)在論及「中」蘇談判時，則認爲雙方領導各自視談判合於他們最大利益。對蘇聯而言，與中共邊界緊張的鬆弛可容許它在西部陣線部署更多的壓力。對中共而言，玩「俄國牌」可使北平對雷根政府繼續與臺灣維持關係一事有一個表露不滿的發洩之地。小川提出一個疑問，就是「不能肯定雙方準備作什麼，不過似乎他們不會突然修補所有的破牆，並且共同發動統一運動以赤化世界，雖然必須警覺到這是共產黨的長期目標。」小川並且提出索忍尼辛在日本演講的證詞：「相信中共不像蘇聯，主張中共是個好共產主義，並且信任他們有如朋友，都是一大錯誤。共產主義無所謂好或壞——都是壞的」^⑮。顯然，小川對「中」蘇關係的改善懷有無限的隱憂和不安。

在學術界方面，日本的中共問題專家中嶋嶺雄認爲一旦「中」蘇雙方有了衝勁，會相當地改善關係，甚至達到類似五〇年代的聯盟的程度。中嶋引證中共同意和解的因素之一是，北平和莫斯科需要團結一致以應付所謂的「社會主義危機」，例如最近的波蘭和阿富汗事件。中共和蘇聯現在都決定不單是爲了他們各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而且也是爲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利益，必須如此作。他表示，進行中的磋商祇是冰山的頂端而已，爲了國際社會主義的緣故，兩「國」註定要再度聯合^⑯。另一位學者小島朋之在所著「中蘇關係與日本外交」一文的結論裏，建議日本對於「中」蘇關係應有的適應之道：(1)日本應該堅持以一種冷靜的態度注意「中」蘇關係的動向，西方諸國對於「中」蘇接近一事，近乎異常的慌張騷動，正是中了「中」蘇雙方的下懷。(2)「中」蘇關係的變化，依照其變化程度大小相應地會帶動「中」蘇雙方與西方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事實上，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因反蘇戰略而結合的戰略合作已逐漸後退。日本不應該以「中蘇對立不會發生變動」來作爲外交的基本前提。(3)日本應該確認對中共、對蘇聯的關係是不同體制間的關係，尤其是對中共關係一向忽略了這個事實。當一九八二年九月前鈴木首相訪問中共，他在北平演講提及「中」關係時說：「二次大戰後的世界，從沒有一個先例像這樣兩個不同體制的國家之間充滿了密切、友好精

註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註⑭〔讀賣新聞〕，一九八二年十月廿五日。

註⑮ *The Japan Times*, Oct. 31, 1982.

註⑯ *The Japan Times*, March 21, 1983.

神，相互合作、前進。「但是這段講詞在「人民日報」刊載的摘要裏被刪除了。可見中共並不像日本如此樂觀地看待「不同體制」的日「中」關係。(4)因此不應該以好惡之心判斷日本對蘇、對中共關係，而應以國家利益的得失利害來處理對二者的關係。(5)重視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優先順位、國家目標與國家戰略，引導日本國民使之對問題有一致的意見。對於「中」蘇關係變化，應當以「最佳選擇時機」作為國家利益、戰略的選擇準則^④。顯然，小島的見解是主張日本應冷靜看待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發展，按照國家利益的需求再作應變，不相信日本與不同體制國家可以密切友好交往的錯誤觀念。

除了美國和日本對「中」蘇關係正常化發展予以密切注意外，其他國家亦多表示關切或不安。鄧小平對泰國總理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保證，與莫斯科關係正常化並不意味著中共減少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要求越南自高棉撤軍的決心^⑤。寮國代理外長哈法（Kham Phay Boupa）認為儘管「中」蘇關係可能改善，他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中南半島的政策^⑥。越南却擔心蘇聯會減少對河內的支持，雖然莫斯科聲明不犧牲第三國的利益；而河內亦表示希望「中」蘇、「中」越關係都能正常化。巴基斯坦總統齊亞認為如果「中」蘇能改善關係，將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他對中共所提正常化三條件，表示完全贊成^⑦。總之，儘管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正常化「磋商」僅是漫長的馬拉松賽的起步，但已引起有關國家的注意與關切，縱使還未到相應改變對「中」、蘇政策的地步，兩大共產「國家」關係的演變必然會對週遭鄰國帶來相對的衝擊。

陸、未來展望

今年十月間中共與蘇聯預定在北平舉行第三次的關係正常化「磋商」，雙方關係可能持續小幅度的發展改善。最近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外交報告中再度表示：「蘇共與蘇維埃國家真誠希望發展及鞏固與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蘇聯首先贊同在相互關係的基礎上與中共正常化，謀求逐漸擴大雙邊聯繫與接觸的機會。我們繼續進行已開始的蘇中政治協商是值得的，爲了希望得到積極的結果，深信雙方之間關係改善與正常化符合兩國人民真正的利益」^⑧。在葛羅米柯講話後不

註④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問題〕，一九八三年四月號，Pp. 12-14.

註⑤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2, 1982.

註⑥ The Japan Times, Oct. 20, 1982.

註⑦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

註⑧ Pravda, June 17, 1983.

久，即六月下旬，北平即傳出準備十月間進行第三次磋商的消息^⑤；七月初，中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更派遣代表團訪問蘇聯；中共亦參加七月在莫斯科舉辦的電影展。七月三日傳聞中共正式邀請蘇聯副外長卡庇查官式訪問北平，卡某雖然數度訪問中國大陸，但都是以私人身份前去的。七月六日，葛羅米柯會見中共駐蘇「大使」楊守正，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行會談。儘管中共年來仍然不斷謾罵莫斯科，繼續指摘蘇聯對外政策，但是雙方間的關係似乎正在穩定地往前發展。

從過去數年雙方關係發展的過程觀察，似乎蘇聯一直在主動爭取關係改善，作出各種試探和表態。在雙方關係最惡劣期間，蘇聯始終不把中共界定為「非社會主義國家」，在蘇共廿三、廿四、廿五、廿六歷屆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裏，有關蘇共對外政策部份，一直把中共列入社會主義國家的範疇。雖然中共再三拒絕蘇聯所提改善關係的呼籲，莫斯科的欄門仍然為這隻迷途的羔羊而開放著。過去北平譴責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復活的國家，最後仍須承認它在本質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承認對蘇聯的認識與研究不足。一九八一年底，中共「中央」發出題名為「研究蘇聯及東歐集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一份內部文件，要求研究蘇聯問題的中共學者加強研究^⑥。顯然中共在當時準備改訂對蘇新政策，謀求在美國與蘇聯之間保持平衡關係。中共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是前者尚處於落後的階段，在經濟上與開發中國家為伍；而後者是「已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係經濟已開發國家。雙方也具有共同的本質：蘇聯以馬列為師，中共除了以馬列毛為師外，基本上更承襲蘇聯的全套政經法制度。因此，中共似難長久脫離社會主義陣營，鄧小平的「門戶開放政策」希望吸收西方的科技、資金，却惹來了不少資本主義的「流風餘毒」，亦使西方國家心存將中共「資本主義化」的幻想。

在共黨組織結構方面，中共師法蘇共，藉「民主集中制」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毛澤東的個人獨裁與史達林相仿，至於鄧小平一夥是否會走向布里茲涅夫的寡頭專制或變向個人獨裁，仍待事實印證。中共的羣眾組織、政治結構也多仿倣蘇聯的作風與方式，所異者是名稱的不同。

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共採用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亦係承襲蘇聯。五〇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導協助下，中共建立起全套俄式經濟模型。雖然中共為挽救經濟困境，一度對南斯拉夫的自主管理制度深感興趣，今天鄧小平的所謂開明務實作風，仍然未脫離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根本立場，雖作枝枝節節的修正，還是無法解困舒危。最近中共學者照舊主張學習參考蘇聯經濟措施、管理方式。七〇年代以來，中共擴大自西方進口機械、設備，引進西方科技，一時之間似乎北平門戶洞開，近悅遠來；但事實上中共的作為仍然類似蘇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招攬外資的模式。北平強調「四個現代化」，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也與蘇聯的「已發達社會主義」異名同質。中共追求的是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亦即是目前的蘇聯社會景況。

註^⑤ The Japan Times, June 24, 1983.

註^⑥ [星島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共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發展與他國關係的準則，反對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盡力援助與我們共命運、同呼吸的第三世界國家」；「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⁵⁴。中共這些重要原則，除了反霸涉及反對蘇聯之外，其餘都和蘇聯的對外政策原則相似。莫斯科著重(1)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2)發展與已解放國家（從殖民地獨立的新興國家）的關係；(3)支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4)實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互惠合作的政策及堅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陰謀的政策⁵⁵。中共與蘇聯的對外作為，特別是在支持各地的共黨顛覆活動、與西方「和平共處」、發展友黨合作方面並無不同，所異者仍是爭奪勢力範圍的衝突，與對外擴張手段、方式與能力的相異或不足。

雖然雙方具有共同的本質或相似的政策，但是仍有若干差異或矛盾，影響過去的關係，也可能影響未來的關係改善。諸如前述的正常化障礙、中共目前領導階層的變化、國際共產運動的挫折等，都將影響中（共）蘇關係。中共鄧胡領導班子能否穩固地抓緊權力，會對其內外策略有所影響；西方自由世界能否堅定努力，如美國總統雷根所言把「共產主義埋葬於歷史的灰燼之中」，逐次撲滅各地的共產叛亂活動，阻絕國際共運，亦會使北平與莫斯科醒覺有共同合作推展國際共運的需要。由於共產黨本身的擅於權變與玩弄統戰伎倆，往往令外界難以忖測其本意。惟無論如何，中共或蘇共對西方國家的關係僅及於合作與「和平共處」，絕非「和平共存」。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敵我矛盾、生死對立；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則是內部矛盾，並非生死對立，按諸共黨的見解，是可以克服的。中共與蘇共的舊日關係是「兒子黨」與「老子黨」的關係，史達林暴斃之後，毛澤東想躋身為國際共運的領導者，兩黨的關係有了變化，年輕的中共黨終於被年長的蘇共壓抑下去，最後與蘇共分裂。然而在國際共運之中，中共仍具相當影響力，仍在爭取其他「兄弟黨」、友黨的好感與支持。今日中共強調各國共黨之間的獨立平等關係，藉以對抗布里茲涅夫的陰影，布魯的有限主權論係干涉東歐國家的口實，對中共還是一種難以接受的理論。不過，這些都應屬於內部矛盾、分歧。近二十年事實證明，中共與蘇共黨關係的決裂，反而加速兩黨在國際共運的活動與擴大，各地的赤化顛覆活動未見減少，反而增加。對自由世界而言，雙方的分裂成了共產細胞的「裂種」。

北平與莫斯科的另一差異是雙方經濟發展水平和軍事力量的懸殊。沒有雄厚的經濟潛力作後盾，一國的軍事能力是難以建立壯大的。中共既然仍處於開發中階段，其實力自無法趕上蘇聯；而且中共宣稱在五〇年代飽受蘇聯不平等經貿合作的剝削，這種心理偏差仍將影響北平與蘇聯之間的關係。

因此，在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存在着某些心理上與事實上的差異或矛盾，惟總的說來，雙方的確有意為了本身的

註⁵⁴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註⁵⁵ Pravda, Feb. 24, 1981.

airiti

利益，謀求改善關係、化解彼此間的內在矛盾。雙方將會緩慢地、穩定地、小幅度地求取改善，互相試探對方的誠意與耐心，以及避免發展速度太大而刺激到第三者，例如美國。在關係改善的層次方面，先求改善「國家對國家」、人民對人民的關係，至於黨與黨的關係，目前暫不考慮。在作爲方面：(1)擴大經濟、貿易交流頻率，增加易貨貿易數量、開放邊界貿易、加強中共對蘇聯經濟制度——計劃、管理、經營的學習。(2)增進文化、體育的交換合作，包括留學生的選派、體育觀摩競賽、圖書出版物交換、文化藝術團體的交流演出或參觀。(3)恢復科學技術的往來，首從科技人員的交換訪問，並進而考慮發展合作的可行性。(4)解除邊界的緊張氣氛，近年來雙方邊界緊張氣氛已大爲減少。(5)考慮發展相互觀光旅遊合作。(6)中共透過第三者的關係，間接減少雙方間的誤解或磨擦，例如加強與東歐國家的往來，恢復或強化與其他國家共黨的關係，中共與法國共黨復交、與安哥拉政權建交皆是此類表現。但從另一角度觀察，北平亦可藉此試探蘇聯的反應和耐性。胡耀邦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錢其琛分訪匈牙利、波蘭、東德，宣揚中共獨立外交政策，鼓吹各國共黨關係的平等地位，亦可能是挖「蘇聯牆腳」的作法。

值此中（共）蘇關係日益改善之際，自由國家若不能認清共黨本質，徒爲外在形象所惑而亂了陣腳，或爲謀圖誘使中共親向西方而不顧嚴重後果，皆爲不智之舉。美國多數學者固然認爲「中」蘇間的動向不是美國所能控制的範圍；但是西方國家包括美國，仍然希望增加對北平的經貿、科技與政治關係，華盛頓最近准許將雙重用途的科技產品輸往中共，即其一例。中共與蘇聯是具有共同體制的「同質」國家，而共產主義又具有擴張與侵略的本性；中共不會與「異質」的西方世界聯合反蘇、反共，更不會充當西方反蘇的急先鋒。相反地，中共可能與蘇聯重新結合，共同爲拯救社會主義的危機而鬪爭，並抗拒美國所謂的民主十字軍。二次大戰前，美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西歐與德國納粹主義的妥協種下了大戰的悲劇。戰後美國與西方對蘇聯的妥協又形成了東、西對抗與若干國家赤化、分裂的慘境。西方國家與共產集團的妥協、共處並未爲自由世界帶來和平、幸福，歷史殷鑑仍然不遠，西方諸國更須反省警惕。